

秦襄公助平王东迁之“功”再考释

王 博

(天津师范大学, 天津 300387)

【摘要】关于秦国的建立历史上说法不一,较为主流的说法是秦襄公护送周平王东迁有功,进而被周天子封为诸侯。不可否认,秦襄公为秦国的发展付出了巨大努力,为秦的建国打下了坚实基础。但近年来随着考古资料的日趋丰富及后人对古典文献的反复探讨,人们对秦襄公之功及此一时期秦国的地域范围,又有了颇多新的有争议的见解。结合考古资料、文献资料,以及陕西关中地区的地理环境,得出的结论为,秦襄公护送平王东迁之功,不是派兵护送,而是帮助周平王打击戎族与携王势力守卫宗周故地。

【关键词】秦襄公; 周平王; 虢国; 东迁

【中图分类号】K23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3541(2015)02-0082-06

DOI:10.13761/j.cnki.bflc.2015.02.014

秦襄公之所以被封为诸侯,主要得益于西周末年的政治形势。关于宗周覆灭平王东迁的这段历史,史学界争议甚多。身处西汉时期的司马迁由于之前春秋战国的动荡岁月,以及后来秦始皇焚书坑儒,所能见到的有关这一时期的史料甚少。司马迁在撰写《史记·六国年表》时,也不得不提到“秦人既得意,烧天下《诗》《书》,诸侯史记尤甚,为其有所刺讥也。《诗》《书》所以复见者,多藏人家,而史记独藏周室,以故灭。昔哉!昔哉!”^[1](《六国年表》)其撰写《秦本纪》虽然有未遭浩劫的秦国史乘——《秦记》为依据,但《秦记》“不载日月,其文略不具”^[1](《六国年表》)由于资料甚少,司马迁在著录两周之际历史时,应当说难以避免错误。尤其是《秦记》“不载日月”,更为史事的时间和次序的确定造成了困难。所以,司马迁在撰写《史记》时,对两周之际这段历史也只能轻描淡写,一带而过,点到为止。不免后世对这段历史的记载颇有异议。

首先,有学者认为,周平王东迁是因为宗周地区自然环境的破坏。例如,钱穆曾质疑“犬戎之于幽王固为寇,而于申侯平王则非寇实友也。然则平王东迁,特以丰、镐残破,近就申戎以自保,非避戎寇而远引也。”^[2]钱先生认为,平王东迁是因为宗周镐京一带自然环境的破坏,所以才迁都。其次,亦有学者认为,秦襄公护送平王东迁与史实相矛盾。秦襄公救周是帮助幽王抗击犬

戎和申侯,“秦之与平王是敌非友,而《史记·秦本纪》却称秦襄公以兵送周平王,平王封襄公为诸侯。襄公送其仇而平王封其仇,其矛盾难通,罕有如此者”^[3]。认为秦襄公借乏戎之机,逐步占据了关中全境,逼迫周平王东迁。再次,从地理因素上分析,申侯与犬戎联合的可能性不大。崔东壁也曾经提出“申在周之东南数百里,而戎在西北,相距辽越,申侯缘越周而附于戎?”^[4](《崔东壁遗书》)即怀疑平王申侯与犬戎东南、西北两线夹击宗周的策略不太现实。

笔者主要参考了几篇学术界资深专家撰写的论文,其中不免分歧较多,尤其是在秦襄公时期,秦国实际的控制范围到底有多大这一问题上分歧更为明显,晁福林、王玉哲、程平山等人观点颇不一致^①。在秦襄公护送周平王东迁问题上,晁福林认为,秦襄公是绕过携王政权,通过翻越秦岭从岐以西到达关中平原东部,然后送平王东迁的^[5]。程平山与王玉哲则认为,秦是在襄公时期就已经占有了整个关中平原,周平王东迁是为了躲避秦国的扩张,而不是为了躲避戎族^[6]。

笔者拟对该问题提出两点拙见:第一,在秦襄公时期秦国的实际控制范围上笔者较为赞同晁先生的观点,认为秦襄公时期秦国的实际控制范围不会占有整个关中平原东至黄河,而应在今天陕西西部甘肃东部一带;第二,在秦襄公对周王室的功劳上,笔者认为,此时的秦

【收稿日期】2015-01-09

① 晁福林《论平王东迁》认为,平王向秦襄公许诺“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的说法是勉其必取岐丰之地,非谓是时岐丰之地已为秦有,秦的势力应在岐以西地区。王玉哲《周平王东迁乃避秦非避犬戎说》赞同北宋学者王应麟的说法,认为秦襄公救周已经取得宗周畿内八百里之地。程平山《秦襄公、文公年代事迹考》以新出土的清华简为考证结合孔颖达、王应麟的说法同样得出秦襄公时期秦的统治范围已经扩展到整个关中平原。

襄公还不具备派兵护送周平王东迁的实力，而是助周攻伐携王政权有功。

一、秦襄公时期秦的地域范围

秦襄公是秦国的奠基者。司马迁说“秦起襄公，章于文、穆、献、孝之后，稍以蚕食六国，百有余载，至始皇能并冠带之伦。”^[1]（《秦楚之际月表》）秦襄公时期，秦的实际统治范围到底有多大，是判断其有何能力帮助周平王东迁的重要因素。在此，将结合考古资料及文献资料，大致分析一下秦襄公时期秦的地望。

（一）近年来，随着甘肃地区考古学的开展，在甘肃陇南礼县地区发现了大量与秦相关的早期文化遗存，其中包括秦襄公、秦文公的陵墓，专家们考证甘肃陇南地区为秦早期文化的重要发祥地，同时也印证了秦襄公时期秦的地域不会占有整个陕西关中并东至黄河。

1. 《史记》中明确记载：“（襄公）十二年伐戎而至岐卒”^[1]（《秦本纪》），“葬西垂”^[1]（《秦始皇本纪》）。近几年的考古资料显示，秦襄公、秦文公的王陵位居今天甘肃省陇南礼县的大堡子山。考古工作者认为，大堡子山即是《史记》中记载的秦最早的“西垂”墓区。从春秋到战国到秦朝，秦人直奉行东进策略，结合之前陕西境内的考古发掘，考古学界一致认为，秦人共有四大墓区：西垂（即甘肃礼县）、雍（今陕西宝鸡凤翔）、芷阳（今陕西西安南部地区）、骊（今陕西临潼）。其中位于关中的雍、芷阳、骊墓区的特点是秦人的墓区尤其是王陵、帝陵距离都城都较近，与王辉先生的“中国古代王公陵墓一般埋葬在都城附近”^[7]观点相一致。根据这一推断，秦襄公、秦文公葬在西垂，那么襄公、文公时期秦的实际统治区应该离西垂不会很远，通过这一考古发掘大致可以断定春秋早期秦的实际统治范围在岐以西地区即今天的甘肃陇南，陕西宝鸡西部一带。

2. 滕铭予先生对关中地区的秦墓大致做了梳理：“宝鸡地区已发现的秦墓材料数量较多，年代上起春秋早期，下至秦统一以后”；“西安地区已发现的秦墓数量最多，但年代比较集中。目前在该地区还没有发现年代明确属于春秋时期的秦墓，大部分秦墓的年代在战国中期以后”，“大荔地区朝邑墓地已发掘秦墓的年代比较集中。原报告将该墓地的年代定在战国早期到战国末期。”^[8]结合《左传·僖公十五年》秦穆公十五年（公元前645年），秦与晋大战于韩，杨伯峻注韩就位于今天的陕西东部山西西部的两省交界地带^[9]（p.350）。《左传·文公二年》秦穆公三十五年（公元前625年），秦与晋大战于彭衙，杨伯峻注彭衙位于今天的陕西白水^[9]（p.517）。《左传·文公七年》秦康公元年（公元前620年），秦与晋大战于令狐。杨伯峻注，令狐位于今天的山西临猗县西^[9]（p.413）。《左传·成公十三年》秦桓公二十七年，晋

伐秦至于麻隧，杨伯峻引《清一统志》认为，麻隧位于今天陕西关中中部泾阳一带^[9]（p.866）。《左传·襄公十一年》秦景公十五年（公元前562年），秦伐晋于栎，栎位于今天的陕西栎阳位于关中中部^[9]（p.995）。《左传·襄公十四年》秦景公十八年（公元前559年），晋国为了报复秦国，联合诸侯伐秦至于械林。杨伯峻注，械林位于现今陕西泾阳县，关中中部一带^[9]（p.1009）。结合上述材料可知，直至秦景公时期秦与晋之间的争夺还仅仅局限于关中中部一带。秦在关中中部地区还没有站稳脚跟。那么秦襄公所处的春秋早期，秦人的统治区域不可能到达关中中部，更不用说东至黄河了。众所周知，秦人的进军路线是自西向东的。即春秋早期先进入关中西部地区（宝鸡地区，“襄公发戎至岐卒”^[1]（《秦本纪》）。战国早期逐渐占领关中平原的中部地区（咸阳、西安一带），“献公元年，止从死。二年，城栎阳。”^[1]（《秦本纪》）战国中晚期占据关中东部地区（渭南地区，“惠文王八年，魏纳河西地”^[1]（《秦本纪》）正如黄焯所说，秦取今关中部地区，“是其累世蚕食，非一日之故，而谓东迁之初，一举手而横有八百里之地，此理势所必无者。”^[10]（p.165）

3. 考古发现证实，在陕西关中平原东部的澄城、白水一带保留了大规模的战国时期的魏长城遗址，“孝公元年魏筑长城，自郑滨洛以北，有上郡。”^[1]（《秦本纪》）这充分说明战国早期，魏国在河西即陕西关中东部一带具有很牢固的军事基础。秦襄公仅凭其一代国君的努力就国土面积东至黄河绝非易事。

（二）流传于世的先秦传世文献较少提及秦襄公时期秦的实力范围已经扩展到整个关中平原，并且东至黄河。清代学者的著述也对此观点颇有质疑。

1. 正如上文所提及的《左传》中记载春秋早期秦国与晋国发生的几次大战，如韩之战、彭衙之战、令狐之战、麻隧之战、栎之战、迁延之役，都发生在现今陕西关中平原的中东部。秦与晋在这一地区曾展开激烈反复的争夺，秦国胜少败多处于下风，最终还是未能在此地区站稳脚跟。秦穆公曾采纳由余的策略向西伐戎，以至“益国十二、开地千里”^[1]（《秦本纪》），秦最终也只是称霸西戎。

2. 《战国策·卷三》：“楚攻魏。张仪谓秦王曰：‘不如与魏以劲之，魏战胜，复听于秦，必入西河之外；不胜，魏不能守，王必取之。’王用仪言，取皮氏卒万人，车百乘，以与魏。犀首战胜威王，魏兵罢弊，恐畏秦，果献西河之外。”^[11]（卷三）西河之外，即黄河以西，洛水以东，华阴以北，延安以南地区。大致范围在今天的陕西关中平原东部。秦王指秦惠王。可见，秦国占领魏国河西之地的时间不会早于秦惠王时期。

3. 《史记·秦本纪》记载，秦武王对甘茂曾发出这样的感慨“寡人欲容车通三川，窥周室，死不恨矣。”

[1]《秦本纪》秦武王是继秦惠王之后的秦国国君，秦惠王时期，魏国就已经献出了河西之地，秦国基本占据了陕西关中全境，通往三川直指洛阳的大门已经打开。从秦襄公至秦武王历经四百多年，如果秦在秦襄公时期就已占据整个关中平原东临黄河，并且派兵护送周平王东迁至洛阳，四百多年间秦国那么多君王，实现“窥周室”的梦想轻而易举，秦武王又怎会发出如此感慨呢？秦与晋在春秋时期，又怎能在关中腹地发生如此众多的战役呢？

顾栋高也对此持异议“史记秦文公收地至岐，岐以东献之周。岐为今陕西凤翔府岐山县，则丰、镐故京在岐之东，秦未尝有也。可见平、桓之世，晋未灭虢，东、西周犹通，封畿号令犹令于西土；虢、郑遗地之在畿内者，尚无恙。黍离诗人过故宗庙宫室，尽为禾黍，破瓦颓垣，依然如故。使秦有其地，当更营建，无复此景象矣。所以，庄公二十一年庄王与虢酒泉，犹在同州府澄城县；而虢公败犬戎于渭南；犹在西周之封内也。自晋灭虢，断桃林之隘；而秦穆亦东竟至河筑垒，为王城以塞其路，而故京遂判若异域。僖十五年获晋侯舍诸灵台。灵台在西安府郿县，丰、镐之侧。自是周之遗地尽入于秦。西归之好音绝矣，自晋献、秦穆始也。乃知郑诗谱谓秦襄公逐戎横有西都八百里之地者，其说诚疏谬，当以史记为正。”^[12] [p. 538] 可见，顾氏认为，秦吞并整个关中平原的时间不会早于僖公十五年（公元前645年），郑诗谱的记载是错误的。《史记·秦本纪》明确记载了秦的东进路线，秦襄公发戎至岐卒、秦宁公二年（公元前714年），徙居平阳；秦德公元年（公元前677年），初居雍城大郑宫；秦穆公二十年（公元前640年），秦灭梁灭芮^[13]《秦本纪》。杨伯峻注“梁，国土即今陕西省韩城县南之少梁城。”^[9] [p. 384] 陕西韩城县已经东临黄河。可见秦国国土面积最早东至黄河是在秦穆公时期。秦穆公距离秦襄公已经过去了一百多年，秦国才终于兵临黄河。可见顾氏的见解较为正确。

结合考古资料与文献资料，可以得出的结论是：秦襄公时期秦国的实际控制范围在今天的甘肃东部及陕西的宝鸡西部一带。秦襄公在世时，秦的地域范围已经东至黄河占有整个关中，确实是夸大了秦的早期发展。试想，如果秦在襄公时期就已经占据了整个关中平原。那么为什么秦国有襄公、文公、宪公三位先公葬在边远的西垂，而不是葬在早已被周人开发成熟，并且经济发达土地肥沃的关中平原一带呢？秦国占据整个关中平原直至其实力向东巩固发展至黄河，必定是在战国中期以后的事情。正如顾栋高所言“至孝公发奋，东地渡洛，魏人纳地恐后，而河西始悉为秦有。吴起去西河而泣，岂无故哉！”^[12] [p. 541]

二、从地理与政治因素上看秦襄公对周王室

的贡献

秦的发展最初得益于西周末年复杂的政治形势，由于相关史料的缺乏，学术界对《史记·秦本纪》中，关于西周末年秦与周王室关系的记载多持异议。其理由主要认为秦襄公救周是帮助幽王抗击犬戎和申侯，秦之与平王是敌非友，而《史记·秦本纪》却称，秦襄公以兵送周平王，平王封襄公为诸侯。襄公送其仇而平王封其仇，其矛盾难通，罕有如此者^[3]。西周末年，秦与周的关系到底怎样，同时秦襄公对周王室东迁的贡献到底体现在哪里，笔者结合前人研究成果逐一分析。

（一）秦襄公起兵救周的历史背景

在幽王末年，西周王朝嫡庶废立的尖锐斗争中，太子宜臼及其母申后是失败者。太子宜臼逃亡到舅甥之国西申那里，自然也是出于走投无路之下的无奈。周幽王要杀太子宜臼以成就伯服“必求之申”，“申人弗异必杀之”^[13]《郑语》。可见先是宜臼逃亡至申，然后才是幽王讨伐申侯至骊山兵败被申侯杀于骊山之下。《左传》昭公二十六年正义引《汲冢书纪年》云“平王奔西申，而立伯盘以为太子，与幽王俱死于戏。先是，申侯、鲁侯及许文公立平王于申，以本太子，故称天王。幽王既死，而虢公翰又立王子余臣于携。周二王并立。平王二十一年，携王为晋文侯所杀。以本非嫡，故称携王。”^[14] [p. 11103]

新出土《清华简·系年》也有这样的记载：

幽王娶于西申生平王，或娶褒人之女，是褒姒，嬖于王，王与伯盘逐平王，平王走西申，幽王起师围平王于西申，申弗与，曾人乃降西戎，以攻幽王，幽王及伯盘乃灭，周乃亡。邦君诸正乃立幽王之弟余臣于虢，是携惠王。立二十又一年，晋文侯仇乃杀惠王于虢。周亡王九年，邦君诸侯焉始不朝于周。晋文侯乃立平王于少鄂，立之于京师。三年乃东徙，止于成周。晋人焉始启京师，郑武公亦政东方之诸侯。^[15] [pp. 138-140]

以上史料证明了四点史事：第一，是幽王死后的政治形势并非如《史记·秦本纪》所言，即由秦襄公护送平王东迁洛邑，而是有一段“二王并立”局面。第二，关于二王并立的顺序，首先，是周幽王与平王之间的二王并立。其次，幽王死后与平王对立的是虢公翰拥立的携王。携王被杀于晋文侯二十一年，是时，周二王并立的局面才告结束。第三，在二王并立的过程中宗周王畿周边的各种政治势力纷纷卷入到二王火拼的斗争中，并且对平王取得最终的胜利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第四，通过参与王室内部斗争，部分诸侯国的地位得到了空前的提高，并对东周初年的政治形势产生了深远影响。

（二）西周末年宗周王畿周边的主要政治势力分布，及其与西周末年“二王”之间的关系

1. 戎。根据《后汉书·西羌传》记载“自陇山以东，及乎伊、洛，往往有戎。于是渭首有狄、原、圭、

冀之戎，径北有义渠之戎，洛川有大荔之戎，渭南有骊戎，伊、洛间有扬、拒、泉皋之戎，颍首以西有蛮氏之戎。”^[16]《西羌传》根据顾栋高《春秋大事年表》记载，分布在今天陕西省境内及附近的戎族部落主要有如下几支：首先是位于陕西省北部延安府境内的大戎^[12]（p. 598）；位于西安府临潼县东的骊戎^[12]（p. 598）；位于关中西部宝鸡境内及宁夏境内的犬戎^[12]（p. 599）。晁福林考证，平王宜臼所奔申国位于今天陕西临潼附近的西申，而非河南南阳附近的南申。当时，西申侯所联合的戎只是许多戎族方国部落中的一个或几个，而不可能是全部。其中一些戎族部落与宗周正统即伯服、幽王一派的关系是友好的。例如，周先祖不窋曾“奔戎狄间”^[1]（《周本纪》）。周穆王时，“犬戎氏以其职来王”^[13]（《周语上》）。申侯和宜臼可以联合戎族，幽王和伯服也不会将支持自己的戎族拒之门外。晁福林认为“戎主要是幽王、伯服及携王的同盟者。”^[5]《春秋大事表》记载，西申离骊戎的分布地区较近。《史记·周本纪》为什么记载与申侯联合的是犬戎呢？根据顾栋高记载，犬戎分布地区位于今天陕西西部宁夏东部一带，距西申较远，根据常理不大可能联合。笔者认为，此时犬戎不是一个权力较为集中的政治势力，而可能是一个较为松散的由众多部落组成的政治联合体，与平王联合的犬戎大概只是其中的一部分。犬戎作为游牧民族其政治组织也处于迁徙状态，远没有形成夏、商时期的一二三级行政区划体制。犬戎只是西周王朝对这一族群的统称，其内部根据血缘关系也可分为若干部落互不统属。各个部落与西周末年二王之间关系的亲疏也会有所不同，面对二王的火拼其内部也会分为“亲幽王派”与“亲平王派”。所以，与申侯联合的犬戎很可能只是众多部落中的一支或几支亲平王势力，而非全部。

2. 携王政权。幽王死后，“虢公翰又立王子余臣于携”^[17]（p. 60）。童书业先生认为“其立亦拖庇于戎人”^[18]（p. 40）。因为王子余臣立于携地，故称“携王”《竹书纪年辑正》引“《新唐书》：《大衍历仪》记载‘是携即西京地名矣’。”^[17]（p. 61）携与丰、岐、骊相连，很可能是镐京附近某地。携王所居当在丰镐周都旧居。近年出土的《清华简》记载“邦君诸正乃立幽王之弟余臣于虢，是携惠王。”^[15]（pp. 138-140）西周时期有东西二虢，至于所立携王之虢是东虢还是西虢史学界看法不一。雷学淇认为，立携王的是东虢；晁福林认为，立携王的是西虢。笔者较为同意立携王者为西虢。首先，东虢所在根据顾栋高《春秋大事表》记载：位于今天河南省开封^[12]（p. 571），距离宗周王畿甚远，在幽王被杀后，不太可能第一时间迅速拥立携王。其次，东虢灭于郑，此时的郑是随着平王东迁至今天河南荥阳附近的郑国（二王并立时期郑国还未东迁至今天的河南荥阳附近，而是位

于陕西华县境内），跟随平王一起东迁的还有虢国，既然是“东”迁，那么其原居住地应当位于洛阳以西，开封位于洛阳以东。所以，跟随平王东迁的只会是位于今天陕西宝鸡凤翔府的西虢，凤翔与镐京相邻故在幽王被杀后可以在第一时间迅速拥立携王。通过上述分析，就可以推断出携王政权为西虢所立，地域范围大致应在今陕西凤翔与宗周镐京之间。

3. 晋。此时的晋国地望，根据1992—2001年通过对山西临汾天马一曲村晋侯墓地的发掘，发现了晋侯燹父至晋文侯共9位晋侯及其夫人的墓葬，从而确定了这里是西周晋国国都之所在。晋文侯时期的晋国还是蕞尔小邦，正如顾栋高《春秋大事表》所言“晋当春秋之初，翼侯中衰，曲沃内乱，不與东诸侯之会盟，疑于荒遠之地。然其地实近王畿，是时周新东迁。列侯未甚兼并，沈、姒、蓐、黄处在太原，虞、虢、焦、滑、霍、杨、韩、魏列于四境，晋于其中，特弹丸黑子之地势甚微”^[12]（p. 518）。其实力远不能和曲沃伯与晋献公时期的晋国相比。根据“晋文侯乃杀惠王于虢”^[15]（pp. 138-140），可知其是支持平王政权的。

4. 虢。根据顾栋高《春秋大事年表》，虢国分为东虢与西虢^[12]（p. 571）。东虢位于今河南开封府汜水县，西虢旧都位于陕西凤翔府宝鸡东50里。后随平王东迁，更于上阳位于今河南陕州。其支庶留于故都者为小虢。小虢于庄公七年为秦所灭。西虢旧都与犬戎的地望都在凤翔彼此相邻都位于岐山以西，东边与岐山以东的丰镐之地相邻。根据上述分析，其联合拥立携王也是可能的。值得一提的是，携王政权由虢公翰所立可见虢公翰的势力应当较大。

5. 申。根据平王奔西申及幽王死于骊山下这一史实，可知申国地望应离宗周王畿之地不远。晁福林先生认为，平王奔申的申不是位于南阳的南申，而是位于陕西东部的西申^[5]。证实了古本《纪年》及上文《清华简·系年》“平王奔西申”^[15]（pp. 138-140）之说的可信性。《史记正义》云“申侯之先，娶于骊山。”^[1]（《周本纪》）确定其地望距骊山不远，应位于陕西省的关中平原东部。夷王、厉王时申侯的力量逐渐壮大，直至幽王时，申侯之女为皇后，同时王朝卿士郑武公也“娶于申”^[9]（p. 10），加强了申对周王室的影响。

6. 郑。郑的始封地，苏勇认为，郑国最早被封在雍地，在史伯的建议下一步步东迁至今天陕西的华县境内然后再随平王东迁往河南省的中部一带^[19]。其在迁至华县（位于关中平原东部）之时，已经是距离平王最近的一支力量，加上郑武公与平王的叔侄关系。最后，最有可能派兵将平王护送至洛阳的就应该是郑武公。无怪乎隐公六年周桓公言于王曰“我周之东迁，晋、郑焉依。”^[9]（p. 51）

7. 秦。上文已经说明秦襄公时期秦的实际统治范围，应在甘肃东部和陕西宝鸡西部一带。

通过以上论述，可知这一时期关中一带的政治势力分布由东至西分别为：晋、郑、西申、携王、西虢、戎。其与二王的关系是晋、郑、西申、部分犬戎部落支持平王政权；而部分戎族势力、西虢支持伯服与幽王、携王政权。

（三）秦襄公与周“二王”之间的关系

根据顾栋高《春秋大事年表》记载，秦最初的地望是在陕西秦州清水县^{[12] (p. 567)}。近年出土的《清华简·系年》记载，秦“周成王把商奄之民迁到“邽圉”。李学勤先生考证，“邽圉”位于今天甘肃省甘谷县西南，是为秦最早的居住地^[20]。庄公徙故西犬丘，犬丘位于今天秦州西南120里西县故城。秦州与甘谷县都位于今天甘肃省境内。《史记·秦本纪》谓，秦襄公曾经“以女弟穆嬴为丰王妻”^{[1] (《秦本纪》)}。穆嬴嫁丰王的时间为秦襄公元年（公元前777年），亦即幽王五年。晁福林认为，丰王就是伯服。依据是丰京与镐京一河之隔，并有周王祖庙在焉，自当不会有异族称王，称王者必是姬姓宗族。由于丰京与幽王所居的镐京相邻，所以，称王者与幽王的关系也应非同寻常，伯服的身份最符合这一条件。笔者认同晁先生这一观点，秦与戎长时期杂居并与戎世代为仇，为了提高自己的地位同时在与戎人角逐的过程中披上合法的外衣并取得道义上的主动，其所能做的必然是与宗周王室联姻取得正统地位，借助华夷之辨的价值观抗击戎人求得生存。所以，秦襄公家女弟给丰王伯服的举动符合秦国这一时期的政治需求。秦襄公此举也无疑增强了秦在周王室中的影响。秦襄公救周，最初当然是援助周幽王和伯服。

但周幽王死后事情发生了变化，虢公翰与戎族拥立余臣为携王与位于西申之国的宜臼二王并立。这一时期，秦襄公面临的抉择就是拥戴天王宜臼或者拥戴携王。秦襄公抗击戎人其所要利用的是周王室的传统威信，而周平王要与戎族斗争，秦的实力自然是理想的同盟者。秦与平王之间从各自的利益出发，加上秦与戎族历来的敌对关系，秦襄公与平王之间一拍即合。原先来救援周幽王的秦襄公转变为支持周平王。周平王除了封秦襄公为诸侯以外，还对其说“戎无道，侵夺我岐、丰之地，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1] (《秦本纪》)}从这句话可以看出，当时岐、丰之地不在平王之手，周平王的这句话就是对秦襄公所做的政治允诺。

（四）秦襄公助周王室之功并非派“兵”护送，而是帮助周平王攻伐携王政权

幽王死后，陕西关中政权分布可分为三大部分，即陕西关中西部到达甘肃即宝鸡凤翔以西一带为秦所控制，凤翔以东至丰镐一带为虢公、戎、携王控制，骊山以东地区为天王宜臼控制。既然中间隔着位于丰镐的携王政

权，那么秦襄公又是怎么率兵送周平王东迁呢？晁福林先生认为，丰镐以北为渭河，难以通行。秦襄公是从关中西部通过绕道秦岭山，到达关中东部的。其中有《诗经·终南》：“终南美襄公也，能取周地始为诸侯受显服，大夫美之故作诗以劝之”^{[14] (p. 590)}为证。笔者认为，秦襄公带兵绕道秦岭走蜿蜒800里的山路，抵达关中部去护送平王东迁似乎有点不太现实。

1. 关中地区南北都靠山（关中以北是黄龙山，关中以南是秦岭山）中间贯穿一条渭河。古代，渭河一直是东西贯穿关中原的最便捷的交通要道。早在秦穆公时，秦国就通过渭河给晋国运送粮食，从雍城一直到故绛，史称“自雍及绛相继，命之曰泛舟之役。”杨伯峻注：“自雍及绛，盖沿渭河而东，至华阴转黄河，又东入汾河转浍河”^{[9] (p. 345)}如果渭河难以通行秦穆公又是如何将这么多粮食通过渭河运往晋国的呢？兵贵神速，在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时代，秦襄公如果派兵护送周平王东迁，那么经渭河顺流东下是最便捷也是最迅速的办法，为什么要舍简就繁、舍易就难绕道去翻越近800里的秦岭呢？而且秦岭自古以来就是关中南部地区预防外来入侵的天然屏障。秦之四塞（萧关、潼关、武关、大散关）中有两座即武关、大散关是依靠秦岭之险建造的。山路比水路更容易阻挡敌人进攻。对于善于用兵的秦襄公，《毛诗》序曰“《小戎》，美襄公也。备其甲兵，以讨西戎。西戎方强，而征伐不休。国人则矜其车甲，妇人能闵其君子焉。”《史记》也明确记载：“（襄公）十二年伐戎而至岐卒”^{[1] (《秦本纪》)}。说明秦襄公到死也仅仅攻到陕西宝鸡的岐山县附近，距当时周平王所在的西申之地还有近200公里的路程。对于秦襄公而言东西跨越秦岭的确是困难重重、杯水车薪。顾栋高在其《春秋大事年表》中也驳斥终南之诗“终南山凡八百里，互凤翔、岐山、眉三县及西安一府之境，是岐西亦有终南，不得援以为据。况此诗原系輿体，言山之高大必有美材，以称其穹窿；人君尊崇必有令德，以称其显服，未尝指终南为当日之实境也。唯朱传谓‘至正’为至终南山之下，似指为本国之境。而郑笺则谓受命服于天子而来，为下句作起耳，于当日之封域无与也。”^{[12] (p. 892)}。顾氏结合陕西地里的概况指出终南山（秦岭）与渭河一样东西跨越整个关中平原，秦襄公生时所在的岐以西以南地区的山地也属于终南山（秦岭）的一部分。郑诗所言仅仅是文学层面的夸张与赞美不可用作史料说明史实。

2. 左传隐公六年周桓公言于王曰“我周之东迁，晋、郑焉依。”没有提到秦国。《左传》《史记·秦本纪》通篇也几乎没有提及秦国国君与周天子相见的记载。从这里至少可以得出秦与周王室的关系远没有郑、晋二国与周王室的关系亲密。

3. 关于携王政权的覆灭，《左传》正义仅援引《汲

冢书纪年》：“平王二十一年，携王为晋文侯所杀。以本非嫡，故称携王。”^[21]（p.11103）近年出土的《清华简·系年》：“晋文侯仇杀惠王于虢。”^[15]（pp.138-140）关于晋文侯杀携王这一史实似乎也有了定论。但有心的学者会问：携王政权真的只是晋文侯所灭吗？笔者认为，此问题有待商榷。

（1）根据上述讨论晋文侯时期的晋国仅仅是一个小国，而携王却是一个有着以虢公翰及戎人联合拥立的正统政权。《系年》：“邦君、诸正乃立幽王之弟余臣于虢。”^[15]（pp.138-140）虢公翰的身份与“邦君”“诸正”的称谓相吻合^[22]。由此可知，携王的拥立者应该是以虢公翰为代表的畿内诸侯和宗周朝廷群臣。众所周知，平王宜臼是被废太子，幽王与伯服战死后，朝中并无幽王的其他子嗣，虢公翰立幽王的同母弟余臣继位是符合宗周礼制的。携王政权地处关中王畿之地，基础雄厚。无论在天时地利，还是人和，实力远远超过当时的晋国。仅凭晋国一国之力远不能将携王政权消灭。我们至少可以推断出当时的晋国不具备单独打掉携王政权的实力。

（2）结合上文对西周末年关中一带政治势力的地望所做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距离虢公翰最近的亲平王政权就是秦襄公的势力。上文提到秦与戎历来是宿敌，秦襄公在幽王死后转而投靠平王政权。平王向其许诺“岐、丰之地，秦能攻之即有其地”^[1]（《秦本纪》）。当时岐、丰之地既不在平王之手，也不在秦之手而在携王之手。周平王此举是在战略上让秦国配合晋国，自西向东夹攻宗周京畿附近的携王政权。岐、丰之地对于当时的秦襄公来说就是“空头支票”。

（3）《史记·秦本纪》同时记载“襄公伐戎至岐卒”。其中岐地位于今天的宝鸡岐山县一带，其地望在西虢故地凤翔府以东。这一点能够说明秦在襄公时期已经将西虢故地征服。

如果上述推理正确的话，可以得出的结论是：在攻伐携王过程中秦也贡献了力量。秦国将西虢故地征服就至少打掉了当时携王赖以生存的政治资本，配合了晋国自东向西攻伐携王政权的战略需要。岐地的周原也是周的重要发祥地，其中也不乏有许多宗周礼器及周人的祖坟，需要秦国来看管。正如《系年》所记“周室既卑，坪（平）王东迁，止于成周。秦仲焉东居周地，以守周之坟墓，秦以始大。”^[15]（p.141）

以上所论秦襄公帮助周平王征服西虢故地，以及帮助周王室看家守墓，是当时的秦襄公能为周王室所做的最为现实的事情。当时的周平王由于势力的衰落，不得不承认岐以西被秦占领的既成事实。秦派兵护送平王东

迁从上文分析的地理因素上讲，对于还处在岐以西的秦襄公来说实不可取。

综上所述，平王东迁主要是秦、晋、郑三国联合共同完成的，秦襄公的“功”主要就是帮助宗周“守墓”“看家”，消灭岐以西拥立携王的虢公翰及戎族的势力。而真正的派兵将平王送至洛阳的主要是郑国、晋国的势力。秦襄公时期秦国的国土面积就其有效控制范围而言，应在岐以西即今天的陕西宝鸡西部、甘肃陇南一带。而岐以东的地区即携王故地，郑故地、随着携王被灭与郑人东迁，也逐渐被秦国占据，到了穆公时期秦的实力继续向东延伸，在晋国的阻挠下秦与晋在陕西关中平原东部一带展开激烈争夺后失败。随后采纳由余的策略向西伐戎以至“益国十二、开地千里”^[1]（《秦本纪》），直至三家分晋，晋国势力衰落，秦国经过商鞅变法富国强兵之后，才终于将势力向东巩固发展到了黄河一带，在关中平原东部站稳了脚跟。有望再向东一窥周室风采。

[参 考 文 献]

- [1] 史记[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9.
- [2] 钱穆. 西周戎祸考上[M]. 禹贡, 第2卷第5期.
- [3] 王玉哲. 周平王东迁乃避秦非避犬戎说[J]. 天津社会科学, 1986 (3).
- [4] 顾颉刚. 崔东辟遗书[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
- [5] 晁福林. 论平王东迁[J]. 历史研究, 1991 (6).
- [6] 程平山. 秦襄公、文公年代事迹考[J]. 历史研究, 2013 (5).
- [7] 王辉. 寻找秦人之前的秦人以甘肃礼县大堡子山为中心的考古调查发掘记[J]. 中国文化遗产, 2008 (2).
- [8] 滕铭予. 关中秦墓研究[J]. 考古学报, 1992 (3).
- [9] 杨伯峻. 春秋左传注[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9.
- [10] 黄焯. 诗疏平议[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5.
- [11] 战国策[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2.
- [12] 顾栋高. 春秋大事年表[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3.
- [13] 国语[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
- [14] 阮元校刻. 春秋左传正义[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9.
- [15] 李学勤.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贰)[M]. 上海: 中西书局, 2011.
- [16] 后汉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5.
- [17] 范祥雍. 古本竹书纪年辑正[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
- [18] 董书业. 春秋左传研究[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0.
- [19] 苏勇. 周代郑国史研究[D]. 长春: 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10.
- [20] 李学勤. 清华简关于秦人始源的重要发现[N]. 光明日报, 2011-09-08.
- [21] 阮元校刻. 十三经注疏[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9.
- [22] 晁福林. 清华简《系年》与两周之际史事的重构[J]. 历史研究, 2013 (6).

（作者系天津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

[责任编辑 张晓校]